

王小蕾 ◎ 著

TIANJIN YOUTH ASSOCI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LOCALIZATION (1895 - 1949)

全球地域化视域下的
天津青年会研究
(1895—19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小蕾 ◎ 著

TIANJIN YOUTH ASSOCI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LOCALIZATION (1895 - 1949)

全球地域化视域下的
天津青年会研究
(1895—19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地域化视域下的天津青年会研究 (1895—1949) / 王小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161-7922-2

I. ①全… II. ①王… III. ①基督教-团体-研究-天津市-1895—1949
IV. ①B97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056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25
插 页 2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5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全球地域化：审视青年会在华历史发展的新范式	(1)
第一节 青年会在华历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1)
一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传教学范式	(1)
二 20 世纪 50—80 年代：文化侵略观与西方中心观的互视	(3)
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	(5)
第二节 全球地域化之于青年会在华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12)
一 什么是“全球地域化”	(12)
二 “全球地域化”与青年会在华历史研究	(13)
三 典型的区域个案：天津青年会	(14)
第三节 史料简介	(16)
第四节 本书结构	(18)
第一章 从欧西到中国：青年会的全球化进程与地域化实践	(22)
第一节 全球化的青年会	(22)
一 英国：青年会的发源地	(23)
二 美国：青年会的勃兴地	(26)
三 青年会的全球化进程	(28)
第二节 青年会在中国：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互动	(31)
一 中国在青年会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32)
二 青年会在中国的空间区域分布	(35)
三 青年会在中国的地域化实践	(40)
本章小结	(47)
第二章 全球化进程中的地域典范：初创时期的天津青年会	(48)
第一节 自西徂东：天津青年会创建的历程	(48)
一 天津青年会建立的全球化背景	(48)

二	近代天津的文化、宗教与西学	(51)
三	青年会与天津社会的初遇	(57)
第二节	对话与冲突：青年会对天津社会的初步介入	(62)
一	阐释福音、传播西学：青年会争取天津青年人的努力与 尝试	(62)
二	青年会与天津社会之间的冲突与角力	(69)
本章小结		(75)
第三章	生存基础的巩固：天津青年会的制度模式	(77)
第一节	租界与老城并举：天津青年会的发展布局	(77)
一	天津城市发展的国际化特色	(77)
二	租界与老城并举：天津青年会活动场域的扩展	(80)
第二节	跨国合作：天津青年会的人员结构	(84)
一	天津青年会的外籍干事群体	(85)
二	天津青年会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争取	(89)
第三节	补充资金、发掘人才：天津青年会征求会员运动	(98)
一	征求会员运动的缘起	(98)
二	征求会员运动的进行	(102)
三	征求会员运动的成效	(107)
本章小结		(109)
第四章	活动空间的拓展：天津青年会的社会交往	(111)
第一节	与本地基督教会的对话	(111)
一	促进教会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沟通	(112)
二	合作形式的创新：基于性别分工的对话	(115)
三	中日民族矛盾背景下的抗争与联合	(118)
第二节	促进中、西人士的交往	(119)
一	联络来津的中、西人士	(120)
二	密切本地会员与国际干事的往来	(122)
三	对西方世界的涉足	(127)
第三节	搭建政治势力与民间对话的平台	(128)
一	与政治人物的联络：天津青年会的独特生存策略	(129)

二 天津青年会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互动	(133)
三 战争时期的特殊对话	(136)
本章小结	(140)
第五章 信仰、文化认同的构建：天津青年会的宗教思想传播 ...	(142)
第一节 天津青年会宗教思想的引介、传播与诠释	(142)
一 多样化的宗教传播手段	(143)
二 本地会员对青年会宗教思想的创造性诠释	(148)
第二节 天津青年会宗教思想传播的困境	(152)
一 原因及表现	(152)
二 天津青年会的应对之策	(156)
本章小结	(161)
第六章 宗教资源的转化：天津青年会的社会服务事业	(162)
第一节 培育领袖人才	(162)
一 促进知识结构的更新	(162)
二 强健体魄的锻造	(169)
三 合群精神的培育	(175)
第二节 营造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城市环境	(179)
一 推动传统风俗的转变	(179)
二 输入西方思想：以卫生观念的植入为中心	(182)
三 净化城市社会的风气	(185)
第三节 参与反帝爱国运动	(190)
一 20 世纪以来天津青年会对反帝爱国运动的涉足	(191)
二 天津青年会与抗日救亡运动和战后的社会重建	(193)
本章小结	(198)
结论 全球化与地域化：青年会在华历史的一体两面	(199)
参考文献	(206)
后记	(219)

导论

全球地域化：审视青年会在华历史发展的新范式

本书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利用“全球地域化”这一视域，审视和考察全球化的青年会如何在地方社会落地、生根。书中虽以清末或民国时期的天津青年会为研究对象，但是着眼点却是一个超越地方史的问题。笔者希望通过天津青年会在组织结构、社会交往、信仰传播以及社会服务等诸多层面上的特点，了解全球化的青年会的地方化形式。同时，这一问题与政治局势、经济形势、地方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第一节 青年会在华历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作为一个跨宗派基督教团体，青年会自1844年在伦敦建立至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自19世纪后半叶传入中国后，它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息息相关。正因如此，近百年来，中国内地、港台以及西方学者们对青年会在华历史的研究着力颇多。他们力图澄清青年会在华历史的两个问题：一是身份辨识的问题：它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还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抑或是一种曾经一度活跃，最后走向边缘的社会组织？二是本土化的问题：青年会登陆中国之后如何结合不同的地域文化，进而成为在近代中国影响至深的基督教团体？自此，这一研究领域也经历了数次范式转移。其中，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诸多范式都得到了有效应用，如传教学、西方中心论以及中国中心观等。^①

一 20世纪50年代以前：传教学范式

青年会在华历史的研究开展较早。1920年，来会理写就了《中华基

^① Nicolas Standaert, *New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83.4 (October 1997), 573—613.

《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年小史》。该书描述中国青年会四个历史时期^①的发展状况，并得出如下结论：“夫青年会固不难吸引热忱勇敢之人，使之戮力竭诚，共同服务，始终弗渝。然而，此事之所以然，则在青年会有如此永久生命之大源，而获得其生命以为生命也。”^② 1927年，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余日章也写成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史略》^③，对青年会早期的历史加以记述。另外，袁访赉还写就《余日章传》^④。该书是学者们了解余日章这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期最长的总干事生平史事之重要参考。

上述著作的出版奠定了青年会在华历史的研究基础。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尽管这些著作在作者身份、关注角度上有所差异，然而在再现历史的过程中，作者们不免沿用“传教学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可作为“基督教内的学术研究”，意在总结、检验、反思青年会在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相比关注青年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学者们更重视其对宣教事业的贡献，意在解释下列问题：神职人员们推广社会福音时都做了哪些工作？他们在工作中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措施是什么？这些工作对青年会的发展有何助益？

虽然这些研究按照现代学术的准则衡量难免偏颇，但是它们作为一种内在的观察和省思，往往能揭示青年会在华历史发展的某些面向。直至20世纪下半叶，仍有学者沿用“传教学范式”书写青年会在华历史。查时杰的《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一书收录了多篇涉及青年会华籍董事、干事的传记。在《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中，他对青年会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描述，评价了青年会在中国传播、扩展的成败得失。^⑤

① 来会理对青年会在华历史的分期是基于他所身处的时代。大体而言，他认为，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1895—1901年；第二时期：1902—1907年；第三时期：1908—1913年；第四时期：1914—1920年。参见[美]来会理《中华基督教二十五年小史》，青年协会书局1920年版，目录。

② [美]来会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年小史》，第23、24页。

③ 余日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史略》，青年协会书局1927年版。

④ 袁访赉：《余日章传》，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年版。

⑤ 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1983年；查时杰：《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1994年版。

二 20 世纪 50—80 年代：文化侵略观与西方中心观的互视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教会在中国的逐步撤离，中国内地的青年会在华历史研究趋于停滞。这除了因为“冷战”期间中国与海外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学术交流中断外，还受到了“文化侵略观”的影响。所谓“文化侵略观”不是一种理论方法，而是共产党人对基督教在华历史作用的价值判断。它脱胎于瞿秋白在 20 世纪 20 年代非基督教运动期间所提出的“文化侵略论”。毛泽东也曾不止一次的强调：“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中国人民。”^①他还特别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②由于这些论断的影响颇为深远，并具有权威性，从而为基督教在华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基调，即控诉基督教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且在这种权威性没有消解前，学者们也无法更新对基督教在华历史的认识。所以，虽然青年会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贡献突出，但是学者们在对之加以讨论时，依旧沿用“文化侵略论”，将其视为欧美国家利用宗教“麻痹”中国人民的武器。1964 年，杨肖彭编纂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史》^③，就是其中代表。

与之相对，西方学界有关青年会在华历史的研究则方兴未艾。学者们对青年会在华历史的书写大多意在摆脱传教学范式的桎梏，增强学术性，关注青年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人对之所持有的反应。赖德烈在《服务世界——北美青年会的外国事业和服务世界的历史》中辟有专章，介绍了青年会北美协会（以下简称北美协会）服务世界的历程以及中国青年会的开端与进展，对青年会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贡献持肯定的态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03 年版，第 1554 页。

② 毛泽东：《“友谊”还是侵略？》，载《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395 页。

③ 杨肖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史：初稿》，天津市宗教史料委员会，1964 年。

度。他指出，1895—1920年是青年会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全国青年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会员人数持续增多，社会事工蓬勃兴旺。20世纪20年代以后，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趋于平稳，但仍开展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等工作，并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①甘利特的《中国都市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②，对青年会在中国的主体身份进行了明确定位，即“近代中国社会的改革者”。作者认为，青年会是近代中国社会服务的先驱，其变革社会的种种举动皆意在推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尽管上述学者的观点不一，但是他们大都认为：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青年会无疑是外来因素，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文化，而且试图重建中国人的心灵，对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价值体系、政治权威形成强有力的挑战，为其输入现代性。这显然是受到了费正清“冲击—回应”^③范式，以及列文森“传统—现代”^④范式的影响。这两种范式在本质上都属于西方中心观。“冲击—回应”范式的重点是将青年会视为西方冲击中国的重要载体。青年会从中国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不断渗透的过程，从正反两个方面唤醒着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使之向现代社会迈进。“传统—现代”范式则把青年会当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先驱。

由于以上两种范式对青年会在华历史颇具解释力，因而它们也影响着港台学者对这一议题的认知。魏外扬的《清末民初的“青年会”》^⑤，记

①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and World Service of the Y. M. C. A of USA and Canada*, Association Press, 1957.

② Garrett Shirley. S,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0.

③ 所谓“冲击—回应”模式意在将中国描绘成一个缺乏向上动力、停滞不前的社会，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向前发展。[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 列文森开创的“传统—现代”模式强调传统的儒教中国与现代的科学理性从根本上是对立的，儒家传统在走向现代的旅程中已经逐渐失去其价值。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价值观则诞生于西方。[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 魏外扬：《清末民初的“青年会”》，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宇宙光出版社1978年版，第43—50页。

载了清末民初青年会在德、智、体、群四育中的贡献。青年会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以及中国社会的反应都是其关注的焦点。作为现代文明的代表，青年会也被作者视为变革中国社会之动力。

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青年会在华历史的读解仍然大致沿袭“西方中心观”，并由此衍生出几种新的范式。较有代表性的便是“中西文化交流”范式以及“现代化”范式。

所谓“中西文化交流”范式是从文明对话的角度考察青年会在华历史。采用这一研究范式的学者不在少数。

邢文军的博士论文《社会福音、社会经济与青年会——甘博和普林斯顿——北京中心》，通过对北京青年会外籍干事甘博的生活和工作之调查，探讨 1906—1949 年北京青年会与北美协会的互动关系。作者在文中指出，普林斯顿——北京中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互动模式，展现了东、西方信仰文化之间的普遍互动，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特殊互动。^① 邢军的《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1919—1937）》^②，以“社会福音”为中心，研究青年会中国实践的美国背景。刘远城的《中美文化交流的激荡：基督教青年会对晚清社会的适应与交融》^③，通过青年会的价值理念、组织架构等方面的探讨，洞悉了中、西文化在其中交流与互动的规律。

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④一书，辟有专章“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作者意在纠正所谓的“文化侵略观”，正视其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产物的事实。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⑤一书也论及青年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肯定了其在推动中西文明对话时所做出的贡献。作

① Xing Wenjun, *Social Gospel, Social Economics and the YMCA: Sidney Gamble and Princeton-in Peking*,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1992.

② [美] 邢军：《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1919—1937）》，赵晓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刘远城：《中美文化交流的激荡：基督教青年会对晚清社会的适应与交融》，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9 年。

④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⑤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为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首部介绍青年会的论著，陈秀萍的《沉浮录：中国青年运与基督教青年会》^①在介绍青年会在中国的历史时，也采用了“中西文化交流”范式。

虽然“中西文化交流”范式意在将青年会在华历史视为两种文化的相遇，以中性和超然的心态探讨其中的过程和规律。但是，研究者却不能忽视以下两点：（1）青年会在华历史不只是一种文化传播的现象，而是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倘若仅从文明对话的角度对之加以诠释，就会令研究局限于阐释狭义的文化现象而忽略其他。（2）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更多地表现为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拓展和渗透。所以，它注定是一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强势文化象征的青年会在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需要重新审视。

故在“中西文化交流”范式之外，一些学者也试图运用“现代化”的范式对青年会在华历史加以读解。因为青年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青年会的所到之处成为中国与现代世界接触的起点。它在中国从事的社会事工无一例外地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建立公民社会做出了贡献。

鲁珍晞的《青年会——女青年会和中国对公民社会的探寻》^②一文重点谈及青年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肯定了其在中国为创建现代公民社会所做出的努力。莱斯道夫在《改革者、运动员和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1895—1935）》^③一文中，以青年会在中国的社会服务事业为出发点，展现出青年会适应和引领近代中国时代变革的一面。凯勒的《制造现代公民：民国时期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社会行动主义和国际主义，1919—1937》^④，探讨了青年会在社会行动主义的影响下，在中国从事的社会服务、公民教育和学生运动等事工，以及这些事工在塑造模范公民与促进国家建设方面的作用和贡献。另外，近年来，利用“现代化”

① 陈秀萍：《沉浮录：中国青年运与基督教青年会》，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Jessie G Lutz, *The YMCA-YWCA and China's Search for a Civil Society*, 载林治平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1994年版，第623—654页。

③ Kimberly A. Risedorph: *Reformers, Athletes and Students: The YMCA in China, 1895—1935*, Ph. D.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4.

④ Charles Andrew Keller, *Making Modern Citizens: the Chinese YMCA, Social Activ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in China, 1919—193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in Kansas, 1996.

范式开展对青年会在华历史研究的学者还有傅浩坚等人。他们关注的是青年会与近代中国体育发展^①以及青年会与近代中国的职业指导^②等议题。包克强在其博士论文《民国时期中国基督徒对现代性的探索》^③中，以为青年会、女青年会服务的中国基督徒张伯苓、刘廷芳、刘王立明为个案，分析基督教与现代性的关系，展现了民国时期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成为现代化宣导者的精神与实践历程。

尽管作为一种解释力相对完善的研究范式，“现代化”范式对于提高青年会在华历史的研究深度有所助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青年会在华历史研究的束缚同样显现。首先，像青年会这样的基督教团体是否应当承担起引领中国现代化的使命，尚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其次，“现代化”范式的解释空间多停留在宗教事业的外围，难以凸显青年会的宗教身份。再次，它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延续了“西方中心观”，认为中国但凡发生前进、向上的变化都是“西方自己在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上曾经历的那种过程和过程的混合”^④。从这个意义上看，运用“现代化”范式阐释青年会在华发展的历史似乎显得缺乏新意。

进入21世纪以后，受到柯文“中国中心观”^⑤的影响，部分从事青年会在华历史研究者也采用了“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意在讨论青年会与中国社会处境的互动，并使青年会在华历史的研究呈现出下列特色：

一是在从中国基督徒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出发。王成勉对余日章的研究

① 傅浩坚：《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② 韩树双、谢长法：《基督教青年会与职业指导的推展》，《教育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

③ John S. Barwick, *The Protestant Quest for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12.

④ 王立新：《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主要研究范式述评》，载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4年，第123页。

⑤ 所谓“中国中心观”范式是指：其一，是从内部的标准界定中国的历史；其二，重视区域史研究；其三，将中国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特别要关注社会下层群体；其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将其与历史分析相结合。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连续撰文，对余日章的宗教思想、民族认同以及社会贡献详加讨论，令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深受启发。^① 另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本土基督徒对青年会宗教思想的阐释颇具价值。“人格救国”论^②是典型代表。李志刚在《基督教青年会提倡的“人格救国”及其反响》一文中，曾将“人格救国”论视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推广的一种“运动”，并指出它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平民教育和公民教育运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③ 邢福增指出，“人格救国”论并非晚至 1923 年才提出，有关理念其实早已贯彻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各项活动中。^④ 笔者曾有一篇拙文，关注天津青年会的“人格救国”运动，兼论“人格救国论”在抗战前后的发展走向。^⑤

二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赵晓阳的《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本土的、现代的探索》^⑥一书，运用跨学科的理论方法，阐述了对青年会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她在书中比较关注青年会在中国近代宗教、文化、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黄海波在《宗教非营利组织的身份建构研究：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例》一书中，将区域的问题做跨区域的思考，以上海青年会为中心，借鉴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方法，为青年会在华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即合法性约束下的组织身份建

① 王成勉：《余日章与青年会：一位基督教领袖的爱国之道》，《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 年版，第 793—811 页；王成勉：《余日章与公民教育运动》，载《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99—530 页；王成勉：《余日章政教观之研究》，载刘家峰编《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3—203 页。

② 关于“人格救国论”的内容，余日章曾经作出过精辟的总结：“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道德的退化。若非从提倡道德、改革人心着手，则一切救国的主张皆等于空谈……欲挽救人心，必依赖耶稣基督，奉他为教主，方能得胜一切。”参见袁访贵《余日章传》，第 67、68、72 页。

③ 李志刚：《基督教青年会提倡“人格救国”及其反响》，《维真学刊》1994 年第 1 期。

④ 邢福增：《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20 世纪前期个案研究》，建道神学院 1997 年版。

⑤ 王小蕾：《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简析——以 1932 年〈大公报〉为中心》，曾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等主办之第六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国际青年学者研讨会上宣读。

⑥ 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的、现代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构。这个理论框架的提出，有助于考察青年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建构的组织身份，揭示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在进入社会公益领域时所面临身份认同难题及其解决方案。^①

最后是重视对区域个案的讨论。鉴于“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出各组、各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②，从区域个案入手，讨论青年会在中国的历史也成为学者们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门径。2003年，左芙蓉在博士论文《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③中以北京青年会为个案，运用跨文化视角，探讨社会福音思想对北京青年会的影响。该书的重大贡献在于，梳理了北京青年会与抗战的关系。另外，卢海标、申芳对广州青年会的研究，周东华对浙江青年会的研究同样值得注意。这些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于青年会与社会服务和地方公益。^④另外，尚有数篇学位论文涉及青年会在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这些区域包括东三省、山西、山东等。^⑤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青年会中在华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区域个案，天津、上海两地的青年会更为学者们所关注。由于天津是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的所在地，为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故为推动天津青年会的研究，天津青年会曾与南开大学等海内外知名学术机构合

① 黄海波：《宗教非营利组织的身份建构研究：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② [美]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42、143页。

③ 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④ 申芳：《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在抗战期间的社会服务事业》，第二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国际青年学者研讨会宣读论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4年12月9—14日；卢海标：《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抗战前活动述评》，《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周东华：《青年会与民国初年浙江的社会公益教育》，《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

⑤ 周玉蛟：《大连基督教青年会研究（1920—1934）》，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师范大学，2013年；张兰：《比较文化视野下的太原基督教青年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0年；刘军：《民国太原基督教青年会研究（1912—1937）》，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3年；王聪：《从边缘到中心：山东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3年。

作，召开了多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2005年召开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2009年召开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名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文明”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已经出版。该书收录了多篇有关天津青年会研究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记录、分析了天津青年会成立110年来的历史。^①

除此之外，一些从事基督教史、天津城市史研究的学者也对天津青年会的研究有所贡献。侯杰不仅把握了张伯苓作为一个基督徒在非教会大学中所传播的宗教思想与实践，而且重视青年会与《大公报》、南开学校的多重互动关系，评析张伯苓利用宗教思想完成中国人的心灵重建的历史功绩。^②他还指导硕博士生发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中国城市社会——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例》《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和谐——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例》《天津青年会与1920年赈灾——以〈大公报〉、〈益世报〉为中心》《天津青年会的儿童事业》《近代中国看天津管窥——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例》《互利共赢：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关系初探》^③等文章，在天津

① 罗世龙编：《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伯苓：《提倡教育体育与中国人心灵重建》，香港教育学院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2011年；《文史资料与近代中国工商业者研究——以宋则久为例》，《郑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③ 侯杰、秦方：《百年家族——张伯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侯杰等：《英敛之、〈大公报〉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探析》，载赵建敏编：《天主教研究论辑》（第8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侯杰等：《日本侵华时期天津著名实业家宋棐卿的实业思想与实践》，韩国《石堂论丛》第51辑，2011年11月；侯杰、王兴昀：《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城市现代化——以华人领袖为中心的考察》，载李灵编《中国现代化视野下的教会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侯杰等：《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中国城市社会——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例》，《理论学刊》2007年第6期；侯杰等：《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和谐——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例》，《史林》2007年第4期；侯亚伟等：《天津青年会与1920年赈灾——以〈大公报〉、〈益世报〉为中心》，《金陵神学志》2011年第1期。侯杰等：《天津青年会的儿童事业》，《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侯杰等：《近代中国看天津管窥——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例》，《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王军等：《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事业——以〈大公报〉对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侯杰等：《互利共赢：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关系初探》，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11—229页。

青年会乃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外，王兆祥、任云兰、刘海岩、张博、王昊、冯志阳、胡伟、李钊等人也对天津青年会在历史发展中的部分面相进行了探讨，丰富与补充了学界对天津青年会的历史认知。^① 可惜的是，目前研究天津青年会的专著尚未成书。这不得不说是当下天津青年会研究的一个遗憾，需要后辈学人继续努力。

作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所在地，上海青年会的研究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张志伟在《基督化与世俗化的挣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②一书中，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个案，讨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青年会运动所遭逢的身份认同危机，揭示出这场目光远大的基督教信仰运动在中国社会逐渐走向世俗化的发展历程。该书的特色在于：过去学者在讨论青年会在华历史时一般采取“社会—文化取向”，忽视青年会作为一个机构本身既多元又复杂的内部生态面貌。作者却采取“反求诸己”的研究进路，从内部组织的角度检视中国城市青年会的运作机制，进而解开其身份认同危机的谜团。

总之，将青年会在华历史的研究重心发生转移后，中国变为了思考的起点，为青年会服务的华人基督徒开始作为研究的重心，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以及各城市青年会的宗教关怀与民族认同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这无疑拓宽了青年会在华历史研究的范围，使这一研究领域所涌现出的成果更具创新性。稍显遗憾的是，这一研究范式的应用，又容易令学者们淡化、忽视青年会在华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传教士和西方元素。这又同历史的真实发生了偏离。

① 王兆祥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和任云兰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救济活动述论》，均刊于《南方论丛》2007年第3期；刘海岩的《天津青年会的创建与早期发展》、张博的《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文明在天津地区的传播》、王昊的《从“非政府组织”视角看百十年来的天津青年会》、冯志阳的《天津青年会：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范例》、李纳的《天津青年会会长雍剑秋略论》、胡伟的《马千里与天津青年会》，载罗世龙编《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张志伟：《基督化与世俗化的挣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台湾大学2010年版。